

空间生产语境下的村镇聚落体系 认知与规划路径

黄亚平 郑有旭 谭江迪 谢来荣¹

【摘要】：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梳理空间生产的思想缘起、研究进展以及对国内村镇发展的理论启示。基于“人口—土地—产业”村镇聚落发展误区认知、“扁平化—功能性—指向性”聚落体系特征研判，提出“弹性—集聚—融合”的聚落体系规划导向反思。辨析空间生产三元论与村镇聚落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探索性地提出基于“场所—功能”关系的综合空间分析方法，“差异性+功能性+有机性+适应性”的村镇聚落体系重构规划路径，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的空间治理模式。

【关键词】：村镇聚落体系 空间生产 场所与功能 规划方法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3363 (2022) 03-0029-08

我国村镇发展长期处于自组织的无序建设状态，乡村规划与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一方面，村镇规划理论薄弱。规划实践忽视村镇发展的地域性差异特征，沿用城市规划理论、照搬城镇开发建设模式，造成了旅游村无人游、特色村无特色等千村一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乡村规划体系不够完善。规划对象界定不清、上位规划指导不足、传导关系模糊复杂^[1,2,3]。因此，村镇聚落体系作为统筹城乡空间、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抓手，其理论的构建与方法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村镇地区具有显著的地域差异性、人口流动性、产业复合性等特征，相较于城镇而言，村镇具有更加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环境。列斐伏尔强调空间就是社会的产物^[4]，空间不再是外在于生产关系的“容器”，其本身就是生产关系的现实载体。空间生产理论起源于村镇，发展应用于都市社会、国家空间，强调物质空间的动态发展过程，重视物质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的内在联系^[5]。虽然空间生产理论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出的批判性思考，但其理论内核对我国村镇聚落空间发展具有指导价值。特别是在新一轮全域全要素覆盖的国土空间规划中，科学合理地规划村镇聚落体系，有助于优化城乡资源空间配置，提升城乡空间配置绩效。

1 空间生产理论的缘起与发展

1.1 思想缘起：乡村日常—都市社会—城乡关系

列斐伏尔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一生著有 70 余部著作，空间生产理论是他最重要的观点学说。自《空间的生产》一书出版以来，西方社会学界和城市学界掀起了空间生产问题研究的热潮。由于空间生产理论覆盖面广，内容复杂，本文重点聚焦于村镇聚落的空间生产。

二战期间，列斐伏尔对法国比利牛斯山区的乡村社会与农民社区生活进行研究，提出了日常生活的概念，并运用“回溯—前

¹**作者简介**：黄亚平，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省城镇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hust_hyp@sina.com；郑有旭，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生，通信作者，zhengyouxu@hust.edu.cn；谭江迪，奥克兰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博士生；谢来荣，武汉华中科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空间规划研究中心总工，注册城乡规划师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村镇聚落空间重构数字化模拟及评价模型”（项目编号：2018YFD1100302）

证法”来研究乡村社会特殊的历史空间问题。这一方法后被运用到城市的空间生产分析中，为后来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奠定了基础。

随着西方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技术官僚主义的城市规划造成了边缘化、绅士化、阶层化等问题，进而引发了一系列城市空间生产危机。以中心地理论为代表的城市空间几何学已不能完全解释城市空间的社会分化与隔离等问题。实证主义地理学“物化”的空间理论忽视了塑造“空间”的个体以及政治和社会关系^[6]，从而引发了“后工业化”时代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功能结构主义的批判，地理学也逐渐向人文化方向转变。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充满理性的经济主义和实用主义忽视了乡村空间原有的社会、文化多样性，为了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赋予同质化功能的空间形式，并不能带来幸福感与满足感。列斐伏尔指出需要以一种相对的、动态的、与社会经济要素相联系的角度去理解地理学的空间概念^[7]。人类经历的物质变化是社会变迁的表象，其背后的机制是复杂社会发展过程以及其中的权利、联系、日常生活的变迁^[8]。

列斐伏尔意识到传统农业社会的转型不仅仅是建筑形态、景观环境的改变，更是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他在《城市的权利》一书中提出“完全城市化”（complete urbanization）的概念，认为城市扩张使得城市功能向全域扩散，城乡最终会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系统^[9]。他通过“内爆—外爆”（implosion-explosion）来解释“完全城市化”收缩与分散过程的城市肌理。“内爆”就是多种要素向城市高度集聚，从而引发的一系列空间重构；而“外爆”则是由“内爆”引发的爆炸碎片，向外扩散成的多样的、非连续的郊区、工业园、卫星城、农业共同体等空间^[10]。完全城市化也许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假设，但这是将城乡作为整体系统的理论尝试，为城乡关系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1.2 研究进展：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及延伸

从乡村社会空间的研究到都市功能结构主义的批判，再到完全城市化的城乡系统理论构建，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构建的过程^[11]。他深刻反思了空间作为“容器”的传统观点，构建了超越传统的“物质—意识”二元论的空间生产三元辩证法理论框架：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表征的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s）^[10]。

“空间实践”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物质空间的感知，包含现时态的建成环境和历时态的过程演变。“空间表征”是一种概念化的空间，是政府及城市相关从业者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等空间要素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从而推动空间重构的过程。“表征的空间”指人的日常生活特定物质空间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空间表达。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的空间三者彼此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参与空间的形成，三者分别对应着自然实体属性的物质空间、逻辑与形式化的抽象空间、生活与体验的社会空间。通过规划设计构思的抽象空间，作用于物质感知的实体空间，再被人的社会日常生活反馈，构成社会空间三元要素循环渗透的互馈辩证关系（图1）。

空间生产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在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城乡关系、城市群、乡村空间等领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思考与探讨。大卫·哈维聚焦城市空间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构建“社会过程—空间形式”的概念^[12]；爱德华·苏贾致力于构建都市空间文化的多元视野，提出“第三空间”认识论^[13]；福柯通过权利关系视角阐释“异托邦”的概念，并拓展了对空间政治权利的批判性思想^[14]；尼尔·布伦纳、梅里菲尔德等人将城市、乡村、自然环境等空间类别视为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社会空间，认为城市化扩张使得城市功能向外扩散，城乡边界趋于淡化，最终形成一个多元景观系统的星球城市化^[15]；布瑟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将城市群视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拓展了城市群区域主义的研究方法^[16]；哈法克雷就乡村绅士化问题构建以乡村地方性、乡村表征和乡村日常生活为核心的乡村空间三重模型^[17]。空间生产的研究是综合的、广泛的，其理论所强调的物质空间变化反映了社会复杂发展变迁过程这一核心思想，可为中国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提供理论依据与参考。

1.3 理论启示：回归乡村本体与规划实践探索

吴传钧^[18]和刘彦随等^[19]的人地关系理论认为“人”和“地”构成了一个复杂开放的且内部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机制的巨系统。其中，乡村地域系统作为人地关系理论的子集，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乡村空间体系。在此基础上，李红波等^[20]构建了“物质—社会—文化”空间层层递进的乡村空间系统，这与空间生产三元论不谋而合；龙花楼^[41]以“要素—结构—功能”为框架，综合空间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构建乡村重构理论体系。可见，学界对乡村空间属性的认知已从城市偏向逐渐回归乡村本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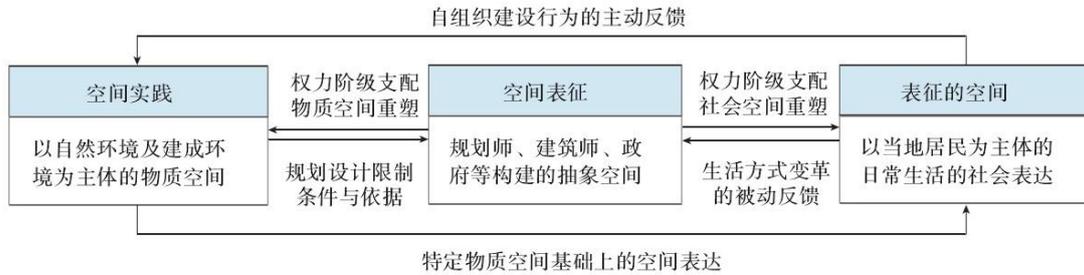


图1 空间生产三元论的互馈关系示意图

随着乡村发展理论的不完善，乡村规划实践也进行了部分创新探索。成都市颁布《四川成都西部片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旨在打破行政区划边界，以形态塑造、城乡产业协同和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为主线重塑城乡关系；上海郊野单元规划基于自然环境要素及聚落演变肌理提出“E+X+Y”（城镇集中安置区+农村集中归并点+农村保留居住点）的单元式规划编制模式^[21]。

中国乡村规划实践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乡村发展特征认知不清、城市规划理论方法混用、地域差异性体现不足等问题。尤其在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与村庄详细规划之间缺少村镇聚落体系规划的传导过程，村镇聚落体系规划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不足。因此，需要认知乡村发展的惯性误区，识别村镇聚落的体系特征，探索新时代更为科学的村镇聚落体系规划方法。

2 村镇聚落发展误区认知、体系特征识别及规划导向反思

2.1 “人口—土地—产业”的聚落发展误区认知

村镇聚落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村镇人口、土地、产业三要素（映射着农民、农村、农业）紧密相连，经济、社会、空间相互交织。现阶段，乡村规划在人口、土地、产业上仍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

(1) 误区一：人口逆城市化是乡村振兴的路径

村镇空心化成为城乡转型发展过程中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态^[2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常住人口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63.9%、45.4%，人户分离人口约为4.9亿人。农村人口季节性、周期性地向中小城市、大城市、都市圈集聚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趋势。在乡村人口面临收缩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的村庄规划仍通过增加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方式，达到所谓的“人才兴旺”的目标。一方面，为了匹配粗放建设用地指标，造成了农村规划人口虚高；另一方面，为布局乡村旅游产业，高估乡村吸引游客的能力，从而使得规划难以实施落地。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在乡村地区并不适用，需要以动态的视角理解城乡人口的流动规律，让乡村人口进得去城、回得来乡。人才兴旺不是简单的人口规模增加，培养本土人才、引导人才下乡以及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才能达到乡村的人才振兴。

(2) 误区二：“村民上楼”是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唯一方式

乡村土地使用的低效、粗放问题是长期存在且亟待解决的。合村并居、增减挂钩都是改善人居环境、集约土地利用的重要抓手^[23]。但一些地方通过“增减挂钩”的方式推进“村民上楼”，建设城市居住区式的高层住宅，节约用地指标反哺城市，形成村民的“被城镇化”。“村民上楼”模式虽然节地效果显著，但实际上使得乡村空间被规划、被占用。一方面，“村民上楼”破坏了村镇原有的聚落肌理，取消了传统农区村镇的庭院、晒场等空间布局，改变了村民的生活习惯，增加了劳作距离，造成了农具、粮食等搬运与储藏的不便，减少了熟人社会的邻里交往，异化了村镇聚落空间格局；另一方面，节约的土地指标并没有用于乡村建设，反而将优质耕地用于城市开发建设，宅基地还耕占补平衡，造成了农村耕地质量降低。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及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农村人均建设用地为430m²，村镇聚落的集约化潜力很大。遵循乡村聚落空间的演变规律，合理分析村民发展诉求，分区分类定制规划方案，不必大规模“村民上楼”，也可实现乡村土地的集约利用。

(3) 误区三：工业、旅游业是产业转型的动力

乡村工业与旅游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对乡村发展起到了引领和带动作用。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初，“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成为各地高水平农村经济模式和典型的农村城镇化模式样本^[24]。但乡村工业“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布模式缺乏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乡村工业多以纺织、机械制造等传统低端工业为主，正逐步被淘汰；同时，乡村工业造成的土地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污染都在阻碍乡村聚落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收入提高、休闲需求增加以及政府大力扶持，乡村旅游作为现代旅游业向传统农业延伸的尝试，结合乡村地区“古、始、真、土”的独特景观^[25]成为了新时代乡村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但多地同质的“农家乐”“购物”“民俗体验”等旅游项目以及诸多仿古街区的“假景观”层出不穷，破坏了生态环境与景观风貌，又缺少对游客的吸引力，反而加速了乡村的低效建设。事实上，工业、旅游业只适用于少数具有区位优势及资源禀赋的乡村，对于中西部传统农业型乡村，以农业为主体的多产融合才是产业转型的可持续路径。

2.2 “扁平化—功能性—指向性”的体系特征识别

传统的“村—镇”层级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村镇聚落体系的特征也与城镇体系中的规模等级、职能类型、地域空间等结构明显不同。

(1) 特征一：村镇聚落等级规模趋于扁平化而非层级化

相比于城镇体系中的等级规模结构，村镇聚落的规模层级并不显著。一方面，村镇是一个较小的地域单元，划分人口的阈值范围较小，按照人口规模划分出来的中心村、基层村等级差距并不大，特别是在城镇村体系中中心村与一般村可看作同一等级，村镇聚落的层级关系不显著。另一方面，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对劳动力的吸引远大于村镇，人口跨级流动使村镇聚落规模等级趋向扁平化。

(2) 特征二：村镇聚落职能表现为功能特征而非职能类型

职能类型是城镇体系规划中的概念之一，是指城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分工，是城镇本身具备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职能作用。从定义上看，村镇对村镇本身以外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弱，多数村镇在一定区域内并不具有职能带动作用。村镇表现出来的是粮食安全、生态保育等功能性作用。乡村地区在区域发展中处于被带动的地位，传统城镇体系中的职能类型概念并不适用于乡村地区，村镇聚落体系中应以“功能性”替代“职能类型”。

(3) 特征三：村镇聚落地域空间是中心城镇指向性而非网络性

要素跨级流动解构了传统的“重点镇—一般镇—中心村—一般村”的村镇层级关系^[26]，形成了具有中心城镇指向性的城乡地域空间结构。人口层面，村民异地兼业行为的普遍化，乡村人口跨级流动现象也从大城市周边乡村拓展到广大乡村地区。所谓“中心村与基层村”并不存在人口流动的网络关系。经济层面，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村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特别是消费方式的改变降低了村民对乡镇企业的依赖程度，村镇的资金要素也向中心城镇跨级流动。公共服务方面，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要求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具有不同标准且均等化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而在村镇聚落关系日趋扁平化的背景下，高质量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同样存在中心城镇指向性。

2.3 “弹性—集聚—融合”的规划导向反思

基于“三农”问题的认知以及村镇聚落体系特征的认识，乡村规划应适应乡村空间生产的“社会—经济—空间”交互作用特征，针对“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实施“弹性—集聚—融合”的规划策略。

(1) 反思一：营造多主体品质提升的弹性乡村

乡村是一处供给站，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同时，乡村是一座蓄水池，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了返乡退路^[27]。人口向城镇化地区流动的趋势不会改变，乡村人口动态变化的特征也将长期存在，要正视乡村人口规模收缩的客观现象。整合聚落居住、生产、生态、服务、社交等空间，进而实现居住空间社区化、农业空间规模化、产业空间组团化的功能异质聚落^[28]。同时，也要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包括产业融合的就业人口、技术扶持的引进人才、农旅融合的体验游客以及返乡的原住村民，营造面向多主体生活品质提升的韧性乡村^[29]，树立乡村弹性发展理念^[30]。

(2) 反思二：构建符合村民意愿的集聚乡村

村镇聚落的集约集聚是乡村空间重构的目标，要着重考虑村民搬迁意愿与聚落地域差异。村镇聚落是以人类活动为主导的地域空间系统，人是主体，聚落是载体，聚落空间的优化应基于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有机更新。地域差异性乡村地域系统的特征之一，根据不同区域村民生活条件、生产状况、收入水平等现状因素，遵循聚落的空间形态演变规律，按人群需求实施差异化集聚集并。

(3) 反思三：激活现代农业主导的融合乡村

农业和工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乡村地区的发展方向不是转向乡村工业化，而是应加大力度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树立以现代化农业为主导、多产融合的产业思路。首先，在宏观区域层面，基于自然本底与发展潜力的研判，甄别地区主体功能、主导类型、主要用途，确定区域产业类型、重点领域与产业体系^[31]。然后，在个体空间不同类型地区落实多业态融合的产业空间布局^[32]。从规划、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快培育现代农业产业，围绕农业生产扩大产业功能，实现农业三次产业联动发展，并将此过程与村镇的功能完善与承载力提升相结合，做到现代农业产业规划与村镇发展规划相结合、新型农业产业培育与村镇内生动力培育相结合、农业示范园区建设与村镇承载力提升相结合（图2）。

3 基于“场所—功能”关系的村镇聚落体系规划

3.1 逻辑本源：村镇聚落体系规划的意义与目的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是时代发展要求，村镇聚落体系科学重构是其重要支撑。首先，乡村价值体现在生态价值、产业价值、文化价值、腹地价值、家园价值等多元层面^[33]，乡村价值的挖掘与重塑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其次，乡村价值决定了城乡在功能定位上的差异性与相互不可替代性，差异表现为城乡聚落、生态、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差异。最后，合理的村镇聚落体系

有助于建设“弹性—集聚—融合”的乡村，避免“个体理性”的规划拼贴忽略中宏观尺度的规划统筹^[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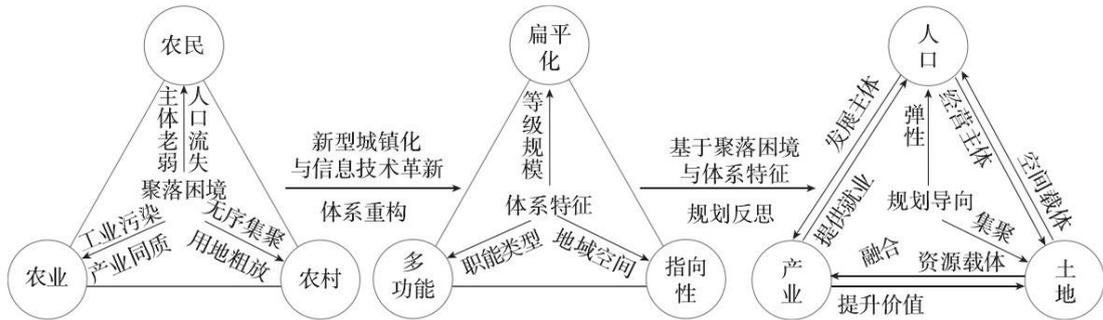


图 2 村镇聚落的现实困境、体系特征、规划导向

村镇聚落体系规划是统筹城乡地域空间系统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村庄作为最小的行政单元，空间规模小、引力弱、能级低，单一村庄在区域中不具有竞争力。然而在乡村地域系统的广泛区域内，村镇聚落体系规划可以统筹具有相似功能的多个村庄个体，形成“人口—土地—产业”的规模效应，促进地区整体发展。另一方面，村镇聚落体系规划承接上一级国土空间规划内容，落实上位规划意图，指导下一级村庄详细规划方案，同时规避因微观“个体理性”造成的宏观“群体无序”问题。可将村镇聚落体系规划纳入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专题内容，确定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聚落规模、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标准、村庄建设规模指引等内容，提出差异化村庄主导产业类型引导策略，有效指导村庄详细规划^[35, 36, 37, 38]。

3.2 学理辨析：村镇聚落体系与空间生产的对应关系

空间生产与村镇聚落人口、土地、产业三要素紧密相关。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动态过程的结果，而在村镇聚落中人口是土地和产业的经营与发展主体，映射着社会空间；土地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映射着物质空间；产业是人口与土地的价值提升渠道，映射着经济空间；三者交互作用。按照空间生产三元论，土地是空间生产的物质载体，表征着乡村的“空间实践”；基于人口和产业的经济社会空间，内在影响着物质空间格局的形成，代表乡村的“表征的空间”；而村镇聚落体系规划则是基于以上要素的交互作用，对村镇聚落未来发展谋划的“空间表征”。图 3。

村镇聚落体系规划的核心目的是优化资源要素的空间配置，具体为聚落数量、人口与用地规模、空间布局、空间联系等内容。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笔者认为村镇聚落体系规划可从“场所”与“功能”两个维度进行研究，这两个维度又可以分别从“场所空间—场所关系”+“功能空间—功能关系”4个方面展开。场所是乡村地域系统中各种自然因素牵引与限制下人类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影^[39]，是显性的物质空间，在村镇聚落体系中，场所空间分析主要关注村民生活居住的聚落建设空间，“地理邻近”是其关键特征；功能是指乡村地域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性质、能力和功效，受隐性的社会经济作用影响，在村镇聚落体系中，功能空间指村镇基于物质空间载体形成的聚落居民点、农业、工业、生态、文化等不同功能的地域类型，覆盖全域空间，“要素关联”是其关键特征。“场所—功能”关系是村镇聚落体系结构规划设计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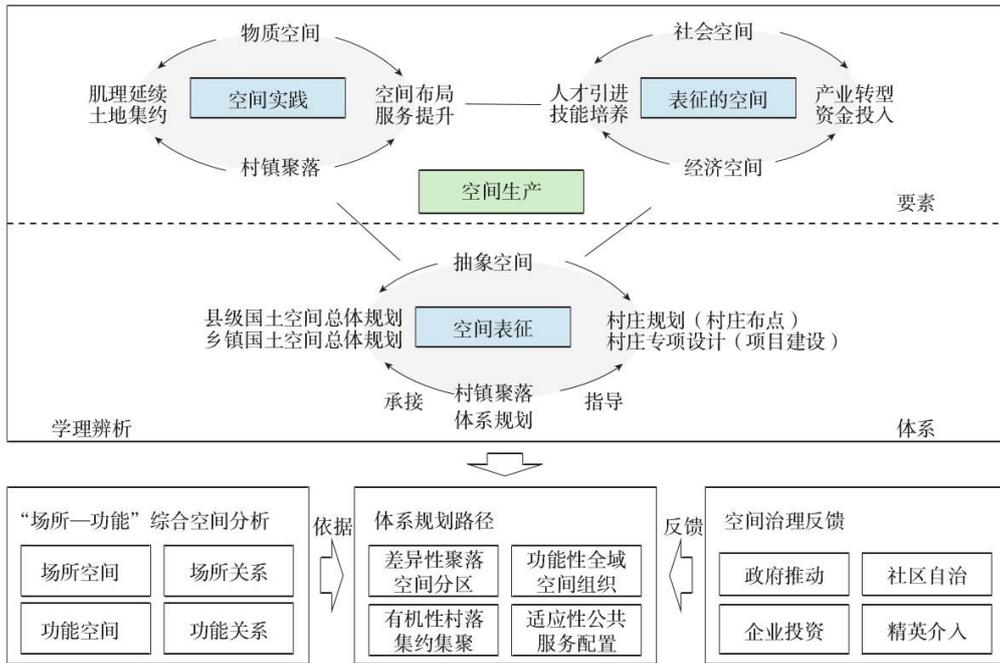


图 3 空间生产语境下村镇聚落体系规划路径建构

3.3 测度分析：“场所—功能”综合空间分析

村镇聚落体系可从“场所空间+场所关系”“功能空间+功能关系”4个层面综合分析。

场所空间是村民生活生产的主要空间，其空间分析可依据建设用地的空间分布进行，具体包括聚落规模、聚落分布、聚落形态、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与布局、道路交通系统组织、基础设施配置与布局，一般运用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形状指数分析等方法进行测度分析。

场所关系是表现聚落联系度的重要指标，包括聚落空间分布的联系强度与设施配置的覆盖程度，分析方法包括引力强度模型、RROD 模型^[40]、复杂适应性系统等分析方法。

功能空间主要为村镇居住、产业、生态等用地的功能布局，其空间分析具体为现代农业、工业、现代服务业、居住用地的空间分布评价。分析方法包括用地适宜性评价、功能分区评价、土壤质量评价、土地综合整治潜力等。

功能关系的测度指标包括手机信令分析、物流数据分析、产业服务覆盖度、魅力空间指数等，具体方法包括构建要素流联系矩阵、要素流联系强度、功能辐射分区等。

“场所—功能”关系也可综合空间要素构建统一的指标体系进行测度。

“场所—功能”综合空间分析应注重聚落空间肌理及地域差异化特征，一般适用于乡镇、县域及以上尺度的测度。例如，黄梅县由北向南依次为山地、丘陵、平原地势，聚落空间形态依次为分散星点型、均衡团块型、集聚条带型。农业功能空间格局由南到北依次为山林采摘农业、两湖种养农业、沿江精细农业。可通过场所与功能空间的分区分类，科学构建村镇多产融合体系结构，确定村镇用地的主体功能、主导类型、主要用途的空间组织（图 4）。又例如汉川市某片区 4 个乡镇，依据聚落规模、道路

系统、设施布局、产业类型、用地类型等指标，进行加权引力模型分析后得到镇域联合的场所与功能关系（图 5），以便为村庄迁村并点、村域联合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提供依据。

3.4 规划路径：“四性”村镇聚落体系重构

村镇聚落体系规划旨在加强乡村地区空间结构与功能的有效衔接与统筹，其核心内容在于对乡镇域、县域或更大区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整合、结构重组和功能优化^[41]。基于空间生产理论，聚落体系空间重构是经济社会过程作用的结果，在“场所—功能”综合空间分析揭示的村镇聚落形态格局及要素关联特征基础上，可以采用“四性”村镇聚落体系重构规划路径。

(1) 差异性聚落空间分区

平原、水网、低山丘陵、山地农区村镇聚落形态有显著的差异性，地理环境、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其“场所—功能”关系及日常生活圈尺度不同。综合考量村镇聚落地理及功能关联状况构建片区日常生活圈，划分市县域聚落空间分类分区，依据每类分区“场所—功能”共性特征，探索形成聚落体系典型谱系，可指导多乡镇联合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多村庄联合编制村庄规划，指导一定区域内相同类型村镇的规划实践。

(2) 功能性全域空间组织

针对村镇聚落体系“职能类型”不明显的特征，现代农业主导、多产融合的乡村地区，全域经济产业、生态及村镇居民点的功能性分区是体系重构的重要内容。通过发展潜力评估，市县或乡镇尺度内分区功能性发展引导，彰显地域资源优势，优化产业功能，实现多业态的三产联动发展，提升村镇多元功能价值。

(3) 有机性村落集约集并

在乡村收缩的背景下，规划应根据乡村人口生活方式及生活质量提升的需求，适度推进分散农户、小斑块聚落空间的撤并，合理确定村庄的“增量”或“减量”，构建“精明收缩（增长）”的聚落空间格局。规划应依据平原团块状聚落、水网轴带状聚落、山地树枝状聚落等典型聚落形态特征，延续村落空间肌理，有机组织村落空间集并或缩减。



图4 湖北省黄梅县土地利用现状（左）、场所空间—功能空间（中）示意图以及村镇聚落体系规划图（右）

资料来源：村镇聚落空间的结构体系研究课题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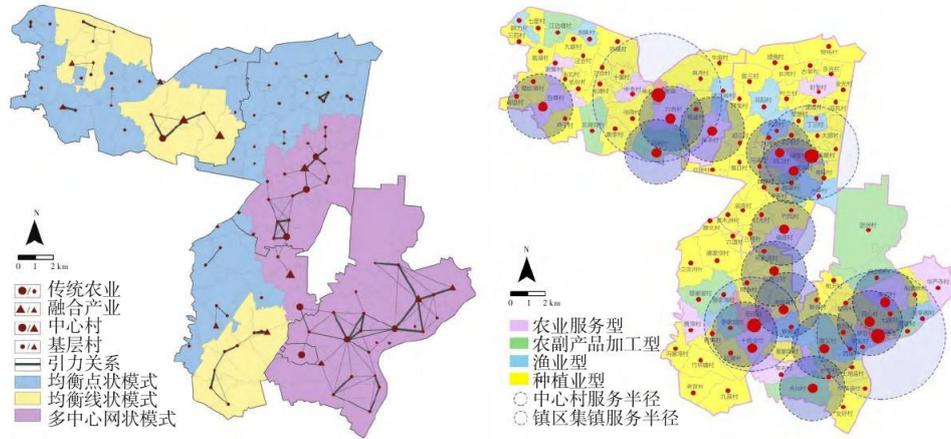


图5 湖北省汉川市同类型四乡镇场所关系（左）、功能关系（右）示意图

资料来源：村镇聚落空间的结构体系研究课题组

(4) 适应性公共服务配置

摒弃乡村公共服务层级化配置的惯性思维，依据村落关系扁平化、新乡村人口（原住村民、下乡创业就业人口、农旅文化旅游客等）多元化特征，评估预测地域公共服务的新需求，综合考量乡村日常生活圈尺度，针对性配置交通设施、文教卫体、农旅文旅服务设施，并注重高等级公共服务适度向县城或中心镇集中，提高村镇聚落体系公共服务的可实施性。

3.5 空间治理：多元主体参与全域空间优化

空间治理是多方参与形成的关于未来发展、空间配置、利益分配的共同认知^[42]。空间生产理论强调，居民的日常生活行为是对规划最好的反馈，规划不是一成不变的真理，是物质空间、抽象空间、社会空间不断反馈与调整、修正与重组的过程。

村镇空间治理既包括物质空间整治的需求，也涵盖空间权属关系、组织模式和系统优化等非实体空间的治理，是体系规划长期反馈机制。村镇聚落的转型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村民自治、企业投入与人才下乡等主体的共同参与^[43,44]。因此，要搭建不同利益群体表达反馈意见的平台，在“物质—权属—组织”三方面实现空间结构治理、经济结构优化、组织效率提升^[45]，进而完善村镇聚落体系规划方案，达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全域空间优化的目标。

4 结语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如何高效有序推动要素互动、因地制宜地构建村镇聚落体系，已成为乡村转型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空间生产理论视角，检视村镇聚落发展及空间生产问题，识别聚落体系特征，尝试建构村镇聚落体系与空间生产的对应关系，提出“场所—功能”的综合空间分析方法、“差异性+功能性+有机性+适应性”的体系重构规划路径，旨在促进我国村镇聚落体系规划理论、方法的发展，更为精准地指导村镇聚落体系及村庄规划实践。

参考文献:

- [1]魏书威,王阳,陈恺悦,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体系规划的演进特征与启示[J].规划师,2019,35(16):56-61.
- [2]耿慧志,李开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乡村地区全域空间管控策略:基于上海市的经验分析[J].城市规划学刊,2020,(4):58-66.
- [3]袁源,赵小凤,赵雲泰,等.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村庄规划编制的分级谋划与纵向传导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20(6):43-48.
- [4]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NICHOLSON-SMITH D, translation. London, Blackwell, 1991.
- [5]李红波,胡晓亮,张小林,等.乡村空间辨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8,37(5):591-600.
- [6]叶超,柴彦威,张小林.“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J].经济地理,2011,31(3):409-413.
- [7]王丰龙,刘云刚.空间的生产研究综述与展望[J].人文地理,2011,26(2):13-19.
- [8]张京祥,胡毅,孙东琪.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物质空间与社会变迁:南京市江东村的实证研究[J].人文地理,2014,29(2):1-6.
- [9]姚华松,黄耿志,陈昆仑,等.超越“星球城市化”:中国城市研究的新方向[J].经济地理,2020,40(4):119-124.
- [10]鲁宝.空间生产的知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21.
- [11]赵海月,赫曦滢.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辨识与建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52(2):22-27.
- [12]叶超,蔡运龙.地理学思想变革的案例剖析:哈维的学术转型[J].地理学报,2012,67(1):122-131.
- [13]韩勇,余斌,朱媛媛,等.英美国家关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新近研究进展及启示[J].经济地理,2016,36(7):19-26.
- [14]孙全胜.空间生产:从列斐伏尔到福柯[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4):89-95.
- [15]邱婴芝,李志刚.21世纪初“星球城市化”研究进展述评[J].国际城市规划,2018,33(4):49-55.
- [16]BUSER M.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metropolitan regions: a Lefebvrian analysis of governance and spatial change[J]. Planning Theory, 2012, 11(3):279-298.
- [17]HALFACREE K. Trial by space for a ‘radical rural’: introducing alternative localities, representations and liv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7, 23(2):125-141.
- [18]吴传钧.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J].经济地理,1991,11(3):1-6.

-
- [19]刘彦随,周扬,李玉恒.中国乡村地域系统与乡村振兴战略[J].地理学报,2019,74(12):2511-2528.
- [20]李红波,吴江国,张小林,等.“苏南模式”下乡村工业用地的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以常熟市为例[J].经济地理,2018,38(1):152-159.
- [21]杨秋惠.镇村域国土空间规划的单元式编制与管理:上海市郊野单元规划的发展与探索[J].上海城市规划,2019(4):24-31.
- [22]刘彦随,刘玉,翟荣新.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J].地理学报,2009,64(10):1193-1202.
- [23]王兆林,朱婉晴,杨庆媛.近30年中国合村并居研究综述与展望[J].中国土地科学,2021,35(7):107-116.
- [24]张敏,顾朝林.农村城市化:“苏南模式”与“珠江模式”比较研究[J].经济地理,2002(4):482-486.
- [25]郭焕成,韩非.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综述[J].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1597-1605.
- [26]耿虹,乔晶,吕宁兴.大城市周边镇村关系层级解构的特征、风险与应对:以武汉市为例[J].城市问题,2018(9):74-82.
- [27]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3):19-26.
- [28]张列.乡村聚落用地功能的演进及其空间分异研究[D].西南大学,2017.
- [29]李红波.韧性理论视角下乡村聚落研究启示[J].地理科学,2020,40(4):556-562.
- [30]李玉恒,阎佳玉,刘彦随.基于乡村弹性的乡村振兴理论认知与路径研究[J].地理学报,2019,74(10):2001-2010.
- [31]刘彦随.中国乡村振兴规划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J].地理学报,2020,75(6):1120-1133.
- [32]赵佩佩,胡庆钢,吕冬敏,等.东部先发地区乡村振兴的规划研究探索:以杭州市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9(5):68-76.
- [33]申明锐,张京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乡村转型与复兴[J].城市规划,2015,39(1):30-34.
- [34]郭炎,刘达,赵宁宁,等.基于精明收缩的乡村发展转型与聚落体系规划:以武汉市为例[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8,10(1):168-186.
- [35]张立,李雯琪,张尚武.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建构乡村规划体系的思考:兼议村庄规划的管控约束与发展导向[J].城市规划学刊,2021(6):70-77.
- [36]张尚武.城镇化与规划体系转型:基于乡村视角的认识[J].城市规划学刊,2013(6):19-25.
- [37]陈小卉,闾海.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下乡村空间规划探索:以江苏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21(1):74-81.
- [38]葛丹东,华晨.适应农村发展诉求的村庄规划新体系与模式构建[J].城市规划学刊,2009(6):60-67.

-
- [39]屠爽爽,周星颖,龙花楼,等.乡村聚落空间演变和优化研究进展与展望[J].经济地理,2019,39(11):142-149.
- [40]唐承丽,贺艳华,周国华,等.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研究[J].地理学报,2014,69(10):1459-1472.
- [41]龙花楼,屠爽爽.论乡村重构[J].地理学报,2017,72(4):563-576.
- [42]孙莹,张尚武.乡村建设的治理机制及其建设效应研究:基于浙江奉化四个乡村建设案例的比较[J].城市规划学刊,2021(1):44-51.
- [43]孙莹,张尚武.作为治理过程的乡村建设:政策供给与村庄响应[J].城市规划学刊,2019(6):114-119.
- [44]戈大专,龙花楼.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J].地理学报,2020,75(6):1272-1286.
- [45]施德浩,陈浩,于涛.城市要素下乡与乡村治理变迁:乡村振兴的路径之辩[J].城市规划学刊,2019(6):107-113.